文化观察

危机时代的文化机遇

□谢有顺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思索硬与软的辩证关系。过去，我们想象中的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一次危机就证实了它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事物，有时却能焕发出极为强大的力量。比如水，是世界上最软的事物了，但一旦水汇聚成了大水，那就无坚不摧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这是老子说的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易被摧毁。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何能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她的文化血脉没有断，文化还在影响人心。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也比历史更永久。200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是台独势力非常嚣张的时候，但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台湾的文化人中，支持台独的人其实很少。为什么？一个台湾教授对我说，他不能接受，一旦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孔子、李白和曹雪芹都将成为外国人，讲述他们作品的课程将变成外国文学课。因此，只要文化的维系力还在，台湾人的心就跑不远，许多时候，文化比军事更有力量。

因此，中国的崛起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流于空谈，而是要真实地通过文化的再造，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文化是一种胸襟、气度和创造力。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没人承认日本是超级大国，就是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终究还不能站立起一种有感召力的普世吸引力。英国《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把文化当作宣传或说教，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亲的、有吸引力的语言和形象来诠释民族精神。

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一些文化机遇已经显露出来，同时对文化意义的再认识也显得迫在眉睫：一，文化的活力在于它对生活和世界有一种反思能力。通过反思，我们就知道，价值观的表达比物质的生产更重要，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亲和力。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无相生。物质是有的层面，文化才是无的层面，有无相生，才能全面呈现中国精神。三，文化能吸引人心靠的是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靠板结的文化符号来完成，而是要靠创造出新的、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才能捕获新的消费人群，因此，要重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力量。四，文化创造力的基础是自由和差异。自由带来创造的激情，而差异则能保存文化的多样性。五，文化平台的建设是发挥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关键。这就要求突破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和行业划分的限制，把文化传播的平台做大，文化的声音才能被倾听，大的平台才能担负大的文化责任。

文化的声音，有时是柔弱的、小的声音，但去到人群中，就可能成为大声音。假若每个文化人都能发出声音，中国就有希望。

选摘自《天涯》2009年第6期

扁平时代的写作

□韩少功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然而，“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

在“扁平”的世界里，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

在“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力比责任更动心，任何共识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47%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时值21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人类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

选摘自《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

创作杂谈

散文写作的困境与思考

□祝　勇

散文的题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由散文家的洁癖造成——题材经过他们的选拔大都洁净光滑、高雅精致，像小布尔乔亚们每天经过处理的下巴。生命中复杂的处境、苦痛、软弱、屈辱、彷徨乃至不被察觉的危险，就这样因其有碍观瞻而被轻易地绕过。我们曾经被一些散文家告知要热爱生活。无须号召，那些经过了加工的生活肯定是人人都热爱的，它们神圣、庄严、浪漫、体面，而且富于戏剧性——在那些被描述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像是经过培训的演员，一口莎士比亚式的台词。遗憾的是，如同堂皇的口号并不能改善我们的境遇，作家的洁癖也无法消解生活的琐碎不堪。当粉饰成为人们早已习惯和依赖的毒品，“转身”和直面就成为我们获救的手段。

失去轰动效应几乎已经成为文学界的普遍话题，散文自然不能免俗。有人藉此对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但这事是否值得懊丧还有待研究。从本质上说，散文是与轰动效应为敌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散文是对散文的篡改和诽谤。

李敬泽说，90年代送给我们的一大礼物就是日常生活。这使散文的话题被分散，经验愈发难以重复，因而，散文的覆盖率在降低。没有一个写作者能够覆盖所有的经验，而在日益局部化和细密的叙述中，所谓的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散文正在履行显微镜的功能。但这是散文的幸运而非不幸，精致细微的感受由于与内心的真实相连，从而降低了叙述的风险。在他人心中不成立的事实可能在写作者心中真实存在着；而试图为所有人准备的真理，却可能遭到顽固的抵抗。写作与阅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相互捡选的关系。所以，好的散文有时让局外人不知所云，它却让志同道合者找到“组织”。

选摘自2010年1月14日《文学报》

呼吁幻想性写作

□程永新

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写作和出版变得格外的容易和轻率；另一方面，文学加速度地边缘化。要实现文学的突围，就只有通过一种幻想性的写作来提振元气，来刺激原创。未来的文学肯定将包含很多种元素，但幻想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幻想性”是艺术的生命，精神产品的特性。新世纪的文学写作趋于集体性低迷状态，表现为处理题材艺术精神的缺乏和对文本结构技巧的轻视。缺乏艺术性，其实就是缺乏幻想性。我们不支持“底层写作”的提出，就是因为它无法解决原创力衰微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幻想性写作呢？莫言的《生死疲劳》将转世的民间传说作为小说的基本框架结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将早晨、中午、黄昏象征一个鄂温克女萨满的一生，贾平凹的《秦腔》以一个古老剧种的衰落来展示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两难处境，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将故事发生的时空搁置在距今几十年后的某些日子里，这些文本体现了人类精神产品的创新精神，它们是对幻想性写作的最好注解。

文学需要整合。未来的文学将是开放多元的，一个有出息的写作者，必能汲取网络文学、类型小说、民间传说甚至手机信息的所有资源，将其融进文学艺术的创造过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狭隘意义的纯文学已经死去。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更丰富、更多元、信息量更大的文学形态。

选摘自《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批评

虚浮的现实性与衰弱的精神性

□张清华

近十年文学的基本走势可以说一直笼罩在一种虚高浮肿的叫做“现实主义”的潮流或氛围中。我们的文学在近十年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与此有关。从写法上看，多是笔法单调乏味、形式陈旧粗陋、故事虚假平淡，偶有起落也多流于概念化，缺乏创造力、可信度和感染力。貌似状写现实，却流于琐屑虚浮。许多作家陷入了肤浅的生活中，越来越缺少深入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

问题当然不在现实主义本身，而在于对现实主义的曲解和滥用，以及对市场和公众趣味的投合。此前“新写实”中相对深沉的悲剧观念、“生存寓言”式的哲学意识、还有相对黯淡的主体情绪与生活图景，渐渐被世俗景观所代替，小说的精神深度被流于现象的叙述弱化了。

精神性的衰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学缺少整体性的思想追求，被表象现实攫持，不能赋予其叙事以整体性的思想与哲学深度；二是不能把笔触通过现实问题的描写深入到历史、人性、生存的主题中来认知，而是将现实问题伦理化、浅表化、情绪化，缺乏深度处理与精神烛照；三是文学手段单一，不能创造与精神的复杂与高度相匹配的艺术形式，甚至表现出与市场合谋、与现实利益合谋的趋势，丧失了人文性与批判性的立场。

文学中的精神衰弱，直观地体现并且深化了某种时代精神的危机。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需要强力介入和改变，否则文学将长期在较平庸的水平上徘徊。

选摘自《长城》2009年第6期

探索

创意写作与美国战后文学

□张　芸

创意写作，英语叫作Creative Writing Program，是地道的美国原装货。不同于一般大学课程、由学识渊博的教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思维方法。创意写作的教学比较接近集体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十几个学生与老师组成一个合作团体，每个学生在课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其他人各抒己见，优点、缺点、称赞、批评、修改意见……老师作为中介人，负责控制调节讨论的节奏，确保不偏离主题，也发表个人看法，但不是从权威者的角度。因此，《纽约客》作者露易丝·曼南德把创意写作的教学理念概括为：“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能被发表的诗歌。”

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成立的第一个作家工作室发展至今，全美目前有822个创意写作班，153个授予艺术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其中37个还颁给博士学位。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墨西哥、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开始效仿美国，在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

创意写作的兴起及大热与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繁荣有紧密联系。上世纪60年代，美国高校数目急遽增加，主要集中在公立院校的建立，势头最旺时，平均一周便有一所社区大学诞生。对院校而言，提升学术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授予学位的专业科目，写作班便在这股大潮中，越来越多的成为授予艺术学位的创意写作系。

写作班大热的另一个原因与战后美国政府的助学政策有关。“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旨在向二战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补助，引发了一股高校入学潮，很多人选择了不需特别专业背景的写作班。课上，他们把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见闻述诸笔端，这些独特的个人叙述，反过来吸引了专业作家的注意。

创意写作集中体现了美国进步教育的主张。每个写作班的老师几乎都会说：“写你知道的。”不断从个人的经历、回忆、观察、思考中深挖素材，写出以往没人写过的原创作品。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用写作完成个人体验。

学院式的训练是否会伤害艺术创作的自由个性，为何要把私人写作纳入制度化的学院体系？支持者如保罗·安格尔等表示，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给予作家经济上的支持或尊重太少，大学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资助和保护文学创作的责任。

至今，创意写作项目为许多本只能依靠写作或研究基金为生的作家提供了一份有固定薪水的教职。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英语系教授马克·麦格尔认为，除了经济原因，创意写作产生于美国大学的更深层因素，包含了一种企图同时追求自我表现与实现自律的悖论，他将之概括为“制度下的个性化”。

反对者抨击大学写作班不是在培养作家，而是批量制造无个性的写作机器，并把文学的衰落、大师级作家的缺失归咎于此。麦格尔驳斥这些非议属于背离时代、固执守旧的偏见。谁也无法否认，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因此，即使文学真得将死，也决不是项目本身的过错。

选摘自《书城》2009年第12期

《悠悠岁月》：无人称自传

□吴岳添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40年9月1日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自1967年起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00年退休。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约出版了15部作品，其中有刻画一个女人内心历程的《空衣橱》(1974)；以第一人称回忆父亲的《位置》(1984，获勒诺多奖)；回忆母亲的《一个女人》(1987)；回忆童年的《单纯的激情》(1992)；回忆堕胎的《事件》(2000)和描绘嫉妒的《占领》(2002)等。她的作品大多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素材，所以她的写作和生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埃尔诺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因此她要写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但她承认不会像伍尔夫那样写一部现代派小说，也不想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要写出多数人的回忆，为此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用自创的名为“无人称自传”的新体裁，在2008年出版了被称为“社会自传”的杰作《悠悠岁月》。

《悠悠岁月》以埃尔诺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为基础。埃尔诺充分借鉴了莫迪亚诺、佩雷克、勒克莱齐奥几位大师的风格，通过对一些旧照片的印象和感觉，通过对父母的贫困、学习、当教师、秘密堕胎、生孩子、离婚、患癌症、情人、衰老的种种描述，来构成一个女人60多年的成长过程。

埃尔诺创造了“无人称自传”这种崭新的体裁。全书从头到尾都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法语中无人称的泛指代词on来表示“我们”。大到国际风云，小到商场购物乃至家庭和个人隐私，生动直观地反映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今天的时代变迁，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

正如埃尔诺在书中所说：“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对集体记忆的记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悠悠岁月》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汲取了莫迪亚诺等人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表现手法，采用“无人称自传”的体裁，无疑对创建21世纪的法国新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选摘自《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5期

波多黎各女作家罗萨里奥·费莱

□赵德明

波多黎各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9104平方千米，人口约360万，属于美国的一个自由联邦。“庙”虽然小，却为拉美文坛培养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女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当代拉美文学界给她的评语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拉美文学评论界对女性写作的歧视和边缘化，她第一个站出来明确提出：衡量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惟一标准就是作品内在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对同代和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而不是性别；因此她“颠覆”了拉美文学评论界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模式，是拉美第一批用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文学评论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女作家就是罗萨里奥·费莱。

费莱在自己的作品中传达出这样一些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多元、复杂的，传统的文学模式应该打碎，作品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应该平衡，让人道和人性的光芒四射；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讲究跨文本和模糊性写作，讲究严肃的叙述与戏谑、嘲讽的风格相结合。但是她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拉美女性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她对女权主义文学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女权主义文学家意味着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学领域里寻找自己的身份，因为男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样的寻找可以是个人行动，也可以采取集体方式，这取决于妇女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的社会环境；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大多是写实主义的，有很多自传成分，但是并不排除想象，作品中的戏谑和嘲讽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为家长制的社会里，感受着诸多压迫。女作家的语言风格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的题材应该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其中家庭生活的经验可以为作者提供丰富的内心激情和心理活动的素材。在文学品评领域，她主张评论家在分析女权主义文学时不必另设标准，而应该以作品的艺术美和内在思想价值作为通常客观的统一尺度。

费莱的创作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打破了拉美文坛的大男子主义传统标准，结束了拉美女性写作的边缘状态，为改善女作家的创作和出版的环境作出重要贡献。

选摘自《译林》2009年第6期

域外传真

抵达与回归之间

□刘增美

200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移民作家》是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第一部非虚构类作品，也是作者的首部批评文集。

《移民作家》包括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的三篇论文：“部落代言人”、“背叛的语言”以及“个人的家园”。移民作家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同原因造成的移民、流放以及难民处境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流离失所，这是哈金在《移民作家》中营造的想象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林语堂、索尔仁尼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以及昆德拉等著名移民作家在内的“想象共同体”。“部落代言人”主要围绕移民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纠葛展开。作者认为，在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作家必须忠于自己的艺术，因为“只有文学能够穿越历史、政治和语言的屏障抵达读者中间，包括作家母国的人民在内”。移民作家对于艺术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对立。移民作家选择母语还是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往往代表着“忠诚”还是“背叛”。在哈金看来，移民作家坚持使用居住国语言进行创作的动机复杂，他们不仅要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更要面临创作中的“生存问题”。移民作家需要使用合成语言，以确保作品更有意义、更加真实。合成语言给读者带来一种特殊的“陌生化”效果，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移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园”概念的模糊造成了“回归”的困难，“回归”不再指称身体层面的重返家园，而是“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是否把过去看做自我组成部分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创作犹如没有终点的旅行，移民作家游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忠诚与背叛、抵达与回归的矛盾中徘徊，不管是故国的记忆抑或居住国的生存经历，与作家的艺术诉求相比，都已变得不再重要。“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因为其不朽的艺术作品可以穿越国界，抵达故国读者，实现精神意义上的“回归”。

选摘自《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

社会聚焦

气候变化的政治后果

□保罗·赫尔曼　格雷戈里·特雷弗顿/文　刘若楠/译

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传统解读常以资源战争、弱国倾覆、移民激增等为标志，但气候变化并不仅仅包含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夹杂着也加剧着现存的困境，这些困境往往通过外溢效应造成跨国影响。气候影响是多方面的、广泛分布的，并且会产生系统性的后果。只有把气候变化的直接表现形式以及无形的第三层次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影响等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恰当的应对做全面的评估。

物理变化与社会反应

气温升高和水体异常影响着牧场、农作物以及饮用水等自然资源的可用性。相对稀缺会使受影响的群体要么合作、要么竞争。当城市没有足够的资源容纳新的居民迁入时，许多人会向更为繁荣的国家迁徙，引发对移民来源国未能守卫边界的指责以及移民目的国本土主义激烈而可怕的反应。国内群体间竞争的另一条断层线牵涉到不同地区的政治实体，同时，竞争也发生在家族和种族之间。财政收入的减少、新福利需求的出现、传统政治的不平衡使中央政府面临更多压力。

相对缓慢的气候变化会带来巨大的差异。海平面的微小上升使淡水资源遭到盐水入侵，最具破坏性的效果是淡水植物的消失，它们可以帮助清洁并给河流补充氧气，也能够缓冲风暴和洪水。极端气象灾害常常被认为是对平民的灾害而非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极端气象灾害确实使气候影响扩大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气象压力提醒人们，一个气象灾害更频繁、更剧烈、且国家基础设施不断被毁坏的地球的未来是怎样的。

政治影响与制度建设

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水的可用性，会影响地区、国家和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雪线增高和冰川融化都会减少流入湄公河的水量，给那里的居民带来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东亚的制度架构中有所体现。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现有国家以及机构的能力和活动范围。气候变化还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规范的破坏，气温上升和水源缺乏会引起农业衰退，结果可能是该地区更依赖于毒品种植。

气候谈判与全球秩序

气候变化也推动了新的国际制度的确立。一些观察家认为，在以西欧许多国家为代表的气候纯粹派与担心约束性承诺会成为用环境掩盖经济竞争的幌子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美国占据了有利的实用派或中间派的位置。如果美国在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调解，这种中间派立场将是一个支点。然而，美国的立场可能是进退两难。如果美国没有执行严格减排目标，或者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其威望或软实力会加倍受损。主要国家如何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应对或适应会影响全球化进程本身。牢固的合作新习惯和新机制有助于加强全球互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可能足以阻碍全球化进程。

评估气候变化与未来出路

对于安全分析家以及科学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气候变化既是不确定的，也是非常长期的。在当前逐渐显现的国际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协调利益的政治挑战令人畏惧。目前多数讨论关注的是缓解：世界如何减缓并扭转温室气体的累积。然而，这仍然会让世界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变暖。因此思考全球变暖的安全影响意味着思考组织、国家和制度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影响着生物圈，如果意识不到安全政策问题背后隐藏的气候维度，未来的政策行动将会遭遇失败的危险。

选摘自《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本版责编：饶　翔　王　杨